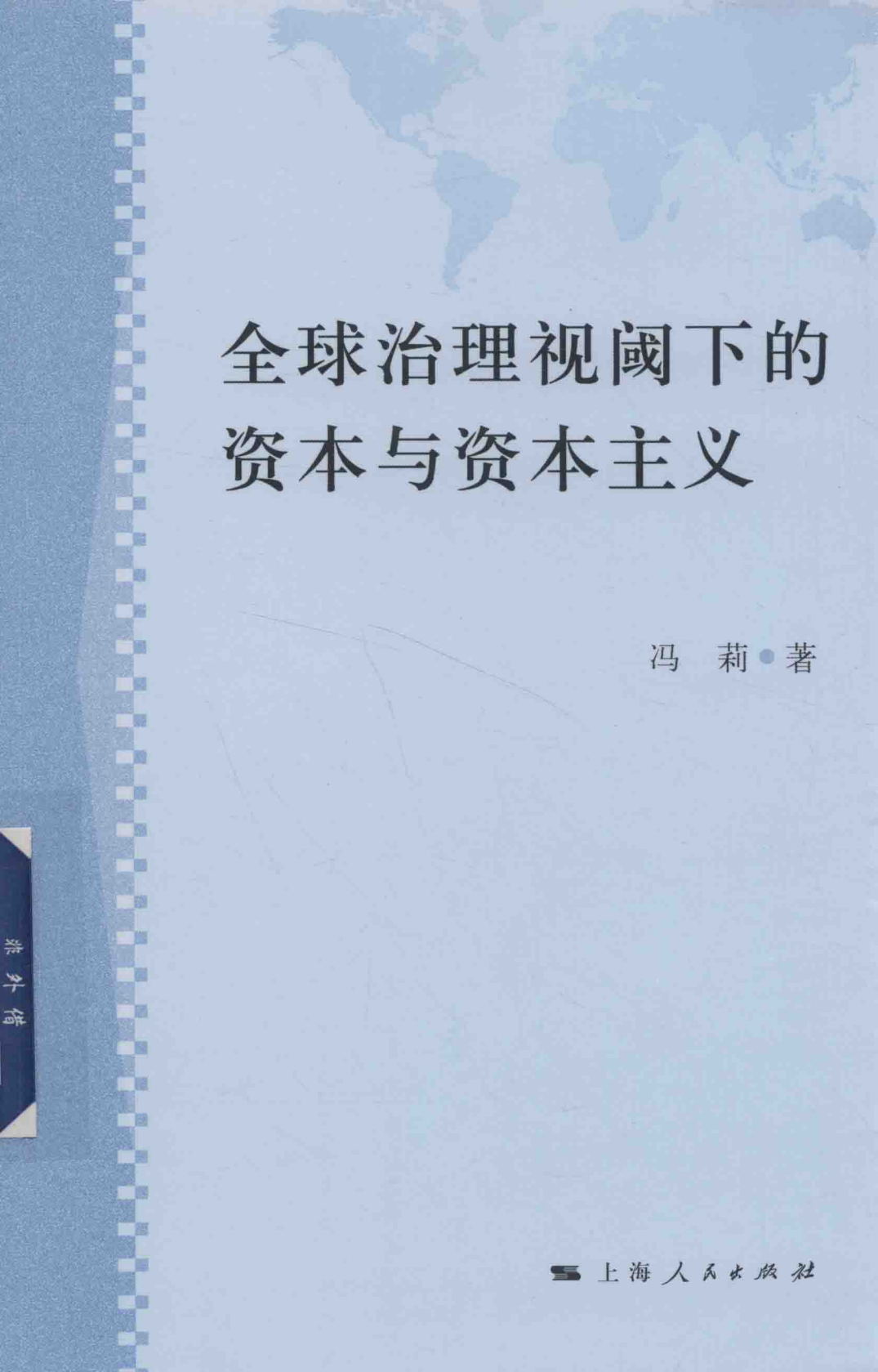




全球治理视阈下的 资本与资本主义

冯 莉 ● 著

海外借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全球治理视阈下的 资本与资本主义

冯 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治理视阈下的资本与资本主义/冯莉著. —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5400-1

I. ①全… II. ①冯… III. ①资本-研究②资本主义-研究 IV. ①F014.391②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1612 号

责任编辑 史美林

封面设计 甘晓培

全球治理视阈下的资本与资本主义

冯莉 著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5.25
插页 4
字数 216,000
版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400-1/D·3270
定价 50.00 元



本书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资金支持



序言 当代世界与全球治理

社会越复杂,问题就越多。

当然,可能机遇也越多。

当每个个体、每个民族和每个国家都难以妄自尊大也难以独善其身的时候,人们所面临的痛苦和幸福也必然成倍地扩大,努力解决问题似乎成为唯一能做的事情。因此,面对当代世界秩序和比秩序还要多的混乱,不断地深入地思索和寻求全球治理就显得特别有价值 and 意义。

而对于什么是治理、如何治理和治理的目标等诸多问题,当前学界给出的答案繁杂多样,又各有千秋,其中的共识是:治理的善的目标。或者说,在社会中的人,必定要在一个旨在促进人的幸福的组织和秩序良好的社会中获得某种善。针对这种可以归属为目的的善,亚里士多德认为:“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¹他把这种“最终的善”或者说“终极的总体的善”称为“最高的善”即“幸福”:一事物(或事务)是因它自身之故被称为善的。如果它处于我们可以期望它的那种最好状态,我们可以期望与它相联系的活动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展现,并且我们的这些期望并不是因它可以因此而对我们的其他某种目的有促进作用而产生。²而人类社会治理的最大的善必须符合最基本的共通的人类社会价值准则,如自由、民主、平等等,不过问题在于,对这些美好范畴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实践。而且,虽然总体上,当前的国际社会是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世界,但是很明显,这个世界仍然饱含着令人极度不安的不平等、不公正,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日益固化

的社会结构以及持续连绵的战火,人类所面临的贫困、疾病、灾荒,民族、宗教、科技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

全球治理的概念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前提是历史的世界史转向。这个转向和资本及资本主义息息相关。“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³或者说,正是因为出现了资本和资本主义,才出现了全球化、全球治理等诸多课题。但是,全球治理所牵涉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态的、国际关系等问题之多,导致直到目前,我们关于全球治理的研究和实践还处于探索之中。对于治理如何才能达致符合人类道德和最大的善的目标,都还没有得到清晰和确定的回答。因此关于全球治理的研究,一定是历久弥新。

全球治理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基础上的,该体系体现出的一个根本原则或者说第一原则就是资本的原则,即以剩余价值的积累为绝对目的。资本原则致力于抹平基于血统、门第、出身以及社会等级而造成的身份差异,也把个体、群体、组织、国家乃至世界的是非、善恶、美丑、真假全部通过资本的逐利逻辑呈现出来,“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

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⁴。同时,推行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对外贸易、发动战争都是在此原则下维护资本利益的主要手段。

18世纪60年代以来,即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的200年中,技术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乃至世界的格局,而当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展现出了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凝聚人类文明与智慧成果的新技术发展,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更会引发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乃至社会整体面貌的深刻变化,也会促使人类更积极地改变其应对方式。正如东西方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持续性的技术革命及其带来的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总能为革新者实施其变化战略提供更多的机会。”⁵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人类文明的大跨越。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和资本原则主导下的全球治理的重要历史贡献。

当前,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重塑过程中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而科学技术的革命给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问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从克隆技术开始的人类道德和伦理危机,到现在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隐含于资本原则下的人类命运问题。而且,从更广阔的视角上,本书所说的“资本主义”并非完全是意识形态框架中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对应的资本主义,而是以资本原则为核心准则和最高价值的资本主义,它引导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理念及其行动方向,也规范着个体的心灵世界、思维模式和行为趋向。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主宰了我们的心灵世界和现实世界。因此,基于此对人类命运问题的热衷,本书在历史史实和历史逻辑发展的支撑下,主要关注当代资本、资本主义和全球治理问题,共分为七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讲述当前世界所面临的旧问题与新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资本原则下的全球治理问题以及因为世界经济政治旧秩序在转向新秩序的过程中,人类社会所必然要面对的秩序波动并在秩序波动条件下新旧秩序交替对国家、民族乃至个人的冲击和影响。

第二部分,主要是对资本原则形成和影响的分析。要确定的是,一方面,当代世界仍然是在资本原则主导下的世界,而且这种趋势正在蔓延至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以及人的道德、价值等全方位和多领域。另一方面,当代世界还是一个资本原则正在逐步让位于社会原则的世界。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对资本势力的警醒,也是因为对资本力量的警惕还没有得到充分和彻底的重视,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能够替代这种力量的新的有效规则或者说标准。

第三部分,是对资本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分析。自从资本出现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当中,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二元的世界,即一方面是财富的迅速积累,另一方面是贫困的迅速积累;一方面是科技的大发展,另一方面是宗教的大发展。这种相互背离的奇异现象,使得未来的世界秩序充满了不确定。

第四部分,是对资本主义所引发的当下社会发展和全球治理困境的分析。种种迹象表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精英集团和大众集团之间的根本矛盾以及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不仅是欧美左翼思潮的批判内容,也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刻反思。

第五部分,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全球统治(治理)实践的分析。自从资本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势力,资本主义对于维护资本秩序、资本利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提出了诸多的看法、方案和设想。这些看法、方案和设想针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端见解各异,但既有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治理思路大都难以跳出资本主义框架,充满了不平等、暴力和强权。

第六部分,资本的多面性和中国道路崛起的价值分析。资本的本质和其展现出来的多样性是复杂的,但是资本本身天然并不从属于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恢复资本的本来面目,节制资本并实现资本为社会主义服务,则是现时代条件下资本的最好归宿。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资本原则的被替代,即资本原则服从于社会原则。这是中国在世界新旧秩序交替,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替代过程中所提供的全球治理

方案。

第七部分,是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无论是追求“最高的善”“自由人的联合体”,还是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过程都是非常漫长和曲折的,因为旧的落后的势力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先进的力量不会一出生就天赋神力。不过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与资本的联盟排斥社会主义相比,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势必要向资本主义开放,而每个人、每个民族和每个国家的每一点努力都是未来人类幸福社会的铺路石。

本书无意去重复过多既有的相关研究,除了经典思想的再现,更多的希望是把最新的事实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尽量客观地展现和演绎出来。我相信全球治理理论以及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研究以后会更加丰富多彩,也希望本书的内容能成为这种发展的重要阶段性见证。

注 释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3 页。
2. 同上书,第 14—19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03—404 页。
4. 同上书,第 402—403 页。
5. 参见高奇琦:《人工智能:驯服赛维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李友梅教授的推荐语。

目 录

序言 当代世界与全球治理	1
第一章 世界面临的旧问题与新问题	1
第一节 当代世界的旧问题	1
第二节 旧问题的新面貌与治理问题	12
第三节 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新旧交替	16
第二章 从资本到资本主义	22
第一节 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	23
第二节 资本的全球化与科学技术	28
第三节 资本主义与资本原则	36
第四节 资本原则与社会原则	44
第三章 资本主义与资本治理	56
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国家治理	56
第二节 资本主义的政党治理	61
第三节 资本主义的社会治理	75
第四章 世界的极化与资本新势力	95
第一节 当代世界的极化	95
第二节 阶层、个人主义与碎片式个体化	112
第三节 智能阶级：资本新势力	127

第五章 资本主义的全球治理方案.....	140
第一节 全球扩张的思想根源.....	141
第二节 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治理方案.....	145
第三节 西方社会主义者的治理方案.....	158
第六章 资本的多面性与社会主义.....	171
第一节 资本的德性与暴力.....	171
第二节 资本的现代文明趋势.....	178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价值与中国道路.....	186
第七章 最高的善.....	199
第一节 亚里士多德:幸福是最高善.....	199
第二节 资本:资本的利己同盟.....	203
第三节 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	208
第四节 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	212
参考文献.....	225
后记.....	234

第一章

世界面临的旧问题与新问题

自从历史转变为世界史,世界格局的变动所折射出的除了各国力量的变化外,还有统治阶级及其理论家对世界发展变化的思考和应对。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资本家集团通过对世界的野蛮剥夺来实现世界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臣服,那么从 20 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则转变为一种“劣等的理想主义”或者说是“劣等的现实主义”¹在法西斯式政治美学引导下的资本社会发展规则,尽管大部分人认为法西斯是一种民族主义,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带着纳粹政治美学色彩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所展现的也是一种通过提出所谓“种族优劣论”或类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全球治理的思路,虽然这个思路是反人类的,必须谴责和彻底根除。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格局以两大阵营的对立为基本特征,只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随着苏东剧变而结束,世界从两极演化为多极,并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全球治理才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

第一节 当代世界的旧问题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曾面临着许多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比如说饥饿、疾病、天灾、交通、通讯等。这么说的意思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和彻底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而是说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绝大多数时候已经不再无能为力。严格来说,笔者所谓当代世界的旧问题,是指当代社会所面临在过去若干年内存在,且至今一直难以克服或解决的有关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基本关注点。

(一) 发展和发展主义

曾经,困扰人类社会的是生产的不发展,因为不发展就意味着生产和生活的原始和落后,是如《李尔王》中所描述的“居无定所、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疲惫不堪”的景象的无穷次的再现。这就自然导致人类对物质进步的渴望。对个人来说,这种对物质的渴望因为个体生命的生存问题显得异常迫切,而对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发展的重要性则关乎着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和未来,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已经不是一个问题,而成为一种国家准则或者说是政治正确。尤其是当发展主义成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或治理理念后,就会把“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依据不同的手段,例如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产生出不同版本的发展主义学说”²,造成发展规模的快速、盲目扩大,过分追求数字比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把经济发展过度标量化,认为发展即增长,只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这就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极大化目标的发展主义。发展主义的一个重要信念就是“认为经济增长比不增长好,快速增长又比缓慢增长好。这种将‘发展’等同‘经济增长’,再将‘经济增长’等同美好生活的信念,本是特定的历史产物,但却被看作为普世通行的真理,支撑着整套发展主义论述,将丰富多元的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约化成单一的面向,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³。实事求是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也是基于此种片面的发展主义的一种,它虽然是迫于国民经济需要快速增长的无奈,有着一定程度的时代性和合理性,但是也导致了人们对发展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的简单粗暴的理解,即快发展就是成功,慢发展就是落后,不发展就是倒退。无疑,这样的观点对于新兴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诱惑力是巨大的。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深入,经济上的惊人成就使得发展主义的强势话语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增强,但对社会、文化、生态等的“忽视”也让人们对发展主义的反思开始逐渐增多。

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 1901—1986)是发展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则是

“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在这种“中心—外围”的关系中，“工业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并不像古典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互利的，恰恰相反，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影响，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⁴这种不对称要求必须发挥国家的力量，集中优势资源，通过制定发展规划，达到更有效和更合理地利用有限资金从而达到提升经济增长率的目标。这些主张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求发展和实现经济独立的强烈愿望。在劳尔·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理论指导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拉美各国开始推行由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转变为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主的发展战略，依托对外开放的强大动力，经过战后十年的努力，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年均增长8%以上，国民经济年均增长6.5%，大部分拉美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原来的400多美元迅速提升到1000多美元，有的甚至达到1500美元左右，成为第三世界工业化进程较快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这就是“拉美奇迹”。但是拉美奇迹的背后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畸形，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这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何其相似。

同时，随着对发展的极化思维的形成，贫困就成为一个价值判断或者确切地说贫困被认为是一种羞耻而不仅局限为对生活必需品的占有，此时，对“发展”的理解就开始出现了某种质的变化。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指出：“我所说的生活必需品，不但是维持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是按照一国习俗，少了它，体面人固不待说，就是最低阶级人民，亦觉有伤体面的那一切商品。例如，严格说来，麻衬衫并不算是生活上必要的。据我推想，希腊人罗马人虽然没有亚麻，他们还是生活得非常舒服。但是，到现在，欧洲大部分，哪怕一个日工，没有穿上麻衬衫，亦是羞于走到人面前去的。没有衬衫，在想象上，是表示他穷到了丢脸的程度，并且，一个人没有做极端的坏事，是不会那样穷的。同样的，习俗使皮鞋成为英格兰的生活的必需品。哪怕最穷的体面男人或女人，没穿上皮鞋，他或她是不肯出去献丑的。”⁵这样一来，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和对贫困的排斥呈高度正相关趋势并迅速泛化，尤其是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发展主义的差异性

受益效应的出现,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大,弱收益以及利益受损的群体不断涌现,社会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而这种趋势至今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最新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Swiss suisse Global Wealth Report)指出:全球财富不平等现象正愈加高涨,事实上,全球百万富翁人数已经跃升至3 600万人,是2000年的3倍,最富有的1%现在占据全球财富一半以上。⁶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已经蔓延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病。

迅速发展的消极后果是发展主义的极端化,这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发展主义的泛滥而让人们忧心忡忡。学者们认为,地球资源是有限的,无限的不加控制的增长(人们普遍把“发展”等同于“增长”)将会导致地球资源的衰竭:“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照现在的增长趋势继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的一百年内某一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的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⁷因此,应该保护地球,地球是全人类的,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具有随心性的、不平衡现象的“全球问题”的加深只会导致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过剩乃至战争爆发。现在的过度发展状况应该引起人们的反思,“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但是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在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个叉路——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抱住我们的地球”⁸。

从本质上说,发展主义强调的是一种要以发展为目标,以经济目标为准绳,从而实现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的绝对替代的发展观,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发展主义进行反思。联合国发展计划开发署1990年主编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发展的真正目的就是扩大人类在各种领域里的选择权,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这是国际社会对发展主义的较早的反思。而从现有的文献看,除了对发展主义的哲学反思和生态反思,20世纪80—90年代后,学者们在后现代主义引领下从更宽广的视野和崭新的视角,对发展主义所产生的社会性危机进行深

入剖析,开始对发展主义展开理论和实践批判,并逐渐形成新发展主义思潮。学者们认为:“所谓新发展主义,是西方左翼基于后现代主义立场对以往发展主义理论和观念的全面清算。新发展主义力主第三世界各国摆脱现代性的价值尺度,拒绝西方主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一条尊重各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发展实际的‘另类’发展方式和路径。”⁹新发展主义反对单纯的经济发展,主张综合的、内生的、全面协调的发展,主张把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均衡发展作为适合这一发展模式研究的主题。同时,“新发展主义对发展主义所倡导的普适性模式提出了质疑,揭示了西方话语建构性的本质,同时还指出市场经济体制只不过是一个‘经济神话’,资本主义世界从来都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实质上,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并非市场而是垄断”¹⁰。

说到底,发展问题还是应被归结为需要克服资本和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发展主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产物,只有不断地滚雪球的发展,资本的存在才有意义。我们之所以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发展主义的负面影响,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身还远没有达到充分的地步,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问题还受限于不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困苦和局囿。但这并不等同于我们对传统的发展主义的认可。只有克服了发展主义自身的诸多弊端,发展才会彻底成为值得人类社会充分信赖的可靠路径。

(二) 自由和自由主义

之所以提到自由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自由主义本身与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前者处于后两者中间,体现出的是不同的国家治理观念。历史上,对自由的界定有无数种,被视为西方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认为,自由、生命、财产是人生而有之和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而在这三者之中,自由是第一位的,是最为本质的东西,并先于我们的存在。¹¹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从不曾有对自由一词的精确而恰当的定义。约翰·艾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John

Emerich Edward Daiberger-Acton, 1834—1902)说:“自由是个具有两种定义的概念,而且除了神学之外,这一大堆解释引起的流血远甚于任何事物。”¹²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也指出:“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¹³

不过,这大概也是古今中外诸多学人热衷解释自由并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之一。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89—1992)曾给“自由”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自由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此一状态下,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在社会中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¹⁴以赛亚·伯林则描述得更为简单和直接:“自由是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主人的期望。”¹⁵相比较而言,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1933—)的“自由”则是指具体人的自由:“对发展的分析以个人的自由为基本要素”,“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¹⁶并认为发展的本质是为了人,而人的本质在于自由,所以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拓展人的自由。而马克思对自由的认识就显得更加系统性。马克思认为,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来空谈个人自由,“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¹⁷,个人自由应该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¹⁸。显然,森的观点更加靠近马克思,也说明人们对自由的理解正是在反思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趋于科学和理性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状态时,又对人的自由问题给予了重点描述。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人本身,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人类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后的生存和发展样态是:那时候的社会分工都是出于自愿形成的,“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¹⁹。从人类受苦受难的发展史视角看,这是一种